

东方的审美

——中日文学交流比较研究

房国铮 林范武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 本书系 2018 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新时代背景下翻译中的文化自信与建构研究”；
- 牡丹江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金项目“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历史症结与历史观研究”MNUB201505；
-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6 年科研项目“应用型高校外语人才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YB201607；
-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6 年教改项目“应用型高校外语人才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研究”16-JG18081；
-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8 年教改项目“翻译专业‘对分课堂’模式下的文化与文学类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18-XJ20027；
- 牡丹江师范学院横向课题“日本王子制纸的产能调节及其海外业务政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东方的审美

——中日文学交流比较研究

◎ 房国铮 林范武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共分为九章,分别为中日文学比较研究概述、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比较视阈下的中日审美意识、中日古代神话的共性与个性、比较视域下中日古诗歌的审美形态、中国“白体诗”与日本古韵文的审美关联、日本古代女性文学与中国文学、日本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借鉴与吸收、民族精神与日本体验。

本书可作为中日文学研究者、文学专业学习者参与借鉴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的审美:中日文学交流比较研究/房国铮,林范武著. —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313-20079-2

I. ①东… II. ①房… ②林… III. ①文学-文化交
流-对比研究-中国、日本 IV. ①I206 ②I31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8927号

东方的审美——中日文学交流比较研究

著 者:房国铮 林范武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谈 毅

印 制:定州启航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mm 1/16

字 数:227千字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20079-2/I

定 价:50.00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3.25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10-61370827

前言

中国和日本作为东方的两大文明国度，其文学都有悠久的历史。在这段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中日文化与中日文学在各个时期均处于较为密切的联系和互动之中，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借鉴，既有明显的民族文化差异，又存在许多共性的成分。中国和日本的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均享有很高的声誉，对中日文学的比较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中日两国学者的广泛探讨。

笔者在《文学翻译与文化视域融合——以〈傲慢与偏见〉的汉译为例》一文中强调“艺术的创作无不凝结着作者超越时代与实践范围的理性追求，无不渗透着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洞察和批判。倘若译作不能够接续原作的生命，不能够映照出原作的精神核心，那它甚至没有实现最为基本的存在价值。”在中日文学交流比较研究过程中，笔者依旧秉持这一观点，以中日文学交流为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地对两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力求最大限度地领会两国文学的精神核心。

日本奈良时代正值中国唐朝开元、天宝年间，此时的古代中国经过发展，呈现出一派鼎盛景象，随着政治上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完善以及经济上商品经济的繁荣，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但是同时代的日本才刚刚开始文明起步。于是，日本在圣德太子改革和大化改新之后，全面吸收唐文化，在元明天皇即位后，仿照唐都长安在奈良建造平城京，并于和铜三年（710年）迁都至此，日本从此进入奈良时代，走上了急速封建化的道路。关于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笔者在《从唐风文化的影响看奈良时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一文中已有叙述，在有关奈良时期中日文学交流对比研究中，本书在原论文基础上作了更加深入、翔实的探讨。

本书主体部分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中日文学比较研究概述，探究中日文学关系、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状况、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第二章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探究学科理论的建设问题以及比较诗学相关问题；第三章比较视阈下的中日审美意识，探究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在审美理念和审美意识上相同与不同之处；第四章中日古代

神话的共性与个性，探究中日古代神话在形态模式、哲学理念、宗教理念等方面的相通与相异之处；第五章比较视域下中日古诗歌的审美形态，探究汉语诗与日语诗诗型特征、日本语韵文的原始形态以及短歌诗型的形成中介；第六章中国“白体诗”与日本古韵文的审美关联，探究白居易诗歌与日本文学的渊源关系；第七章日本古代女性文学与中国文学，探究中国文学对日本女性文学的影响；第八章日本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借鉴与吸收，以川端康成为例，探究川端康成文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渊源；第九章民族精神与日本体验，以民族精神为视角，探讨中日文学中的异同。

从客观角度来看，中日比较文学的研究向来主要是从日本方面进行的，本书则从中国文学方面对中日文学交流进行把握，开拓了中日文学对比的新视野，丰富了中日文学的研究，这样的实践和积累对中日文学交流比较的探究更加客观和有说服力。此外，由于比较文学方面的著作资料丰富，研究对象的领域广阔，对资料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著者的观点往往不够鲜明。本书虽然涉及丰富的资料和广阔的领域，但是作者观点清晰明确，这也是本书的长处之一。

本书围绕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建设问题以及中日文学交流现状，在内容设置和体例安排上，充分体现对中日文学交流比较探究的客观性。将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融入中日文学交流比较之中是本书的重要创新点，笔者将文学与民族精神的相互作用关系纳入比较文学中，全面梳理、审视中国文学中所表现出的民族情感、意识及其书写方式和特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创作和评论都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对文学艺术的殷切期望。

本书作者分工如下：本书共9章，其中牡丹江师范学院房国铮老师负责本书的整体的统筹和规划，并完成1，2，3，4，5章的撰写工作，共12.9万字，牡丹江师范学院林范武老师6，7，8，9章的撰写工作，共11.5万字。

在本书成书过程中，笔者查阅和参考了大量相关资料，均在参考文献中一一列出，在此向各位同仁致以诚挚的谢意。同时，在本书创作过程中，笔者得到了亲人和朋友的帮助和鼓励，同样表达诚挚的谢意。书中不足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目 录

- 第一章 中日文学比较研究概述 / 001
 - 第一节 中日文学关系刍议 / 001
 - 第二节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 / 004
 - 第三节 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 / 006
- 第二章 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 / 012
 - 第一节 关于学科理论建设的问题 / 012
 - 第二节 关于比较诗学问题 / 014
- 第三章 比较视域下的中日审美意识 / 017
 - 第一节 游于儒道佛互补之境 / 017
 - 第二节 主意的情感世界与主情的审美世界 / 038
 - 第三节 自然审美之趣 / 049
- 第四章 中日古代神话的共性与个性 / 066
 - 第一节 中日古代神话研究综述 / 066
 - 第二节 日本“记纪神话”的形态模式及哲学宗教观 / 070
 - 第三节 中国多民族神话在日本创世型神话构成中的意义 / 075
 - 第四节 日本唯美神话的多元化特征 / 084
- 第五章 比较视域下中日古诗歌的审美形态 / 090
 - 第一节 汉语诗和日语诗的诗型特征 / 090
 - 第二节 日本语韵文的原始形态 / 095
 - 第三节 短歌诗型形成的中介 / 097
 - 第四节 汉诗的分解与短歌诗型的组合 / 102

■ 第六章 中国“白体诗”与日本古韵文的审美关联 / 106

第一节 白居易文学传入日本的一般性考察 / 106

第二节 “白体诗”在和歌中被醇化的形态 / 113

第三节 《源氏物语》对白居易诗歌的吸收 / 119

■ 第七章 日本古代女性文学与中国文学 / 127

第一节 日本古代贵族妇女的汉文学修养 / 127

第二节 古代东亚小说的文体特征与唐代小说和日本“物语”文学的融通 / 137

第三节 《源氏物语》中的中国文化要素及其对后世审美的影响 / 142

■ 第八章 日本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借鉴与吸收
——以川端康成为例 / 151

第一节 川端康成的父系家族意识与中国儒家思想 / 151

第二节 川端康成文学的隐喻性特征与《庄子》 / 158

第三节 川端康成文学的艺术美与中国的禅宗意趣 / 164

■ 第九章 民族精神与日本体验 / 173

第一节 民族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 / 173

第二节 中国百年旅日文学中的日本形象变迁 / 186

第三节 中国现当代留日文学比较：以日本女性形象为中心 / 195

■ 参考文献 / 201

■ 索引 / 204

第一章 中日文学比较研究概述

第一节 中日文学关系刍议

中日两国的文学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两者处于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之中，因此相互间存在着许多共性。很久以前就有人认为中日文学是同种同文。诸多前贤，如李泽厚、刘再复等就此方面有过精辟的探究。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笔者又做了一番综合性考察，兹将一些浅见罗列如下，以求教方家。

一、中日文学的基本特征比较

（一）文学在整体文化中的作用

自古以来，中国人受到儒教传统理念的影响，非常重视文学的教化效用，把它视作最为核心的文学理念。所以，中国文学在内容上历来十分看重哲学、伦理、政治主题，认为文学是影响国事的大事，可以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作用。这样的思想一方面提高了文学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很不公平地将文学归为了政治的附庸。一言以蔽之，儒家的入世哲学，虽然使中国文学具有了政治激情、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但这种思想也抑制了文人自我情欲的释放、自由个性的发展和自我认知的深入探究，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使文学遮上了一层理性主义的面纱。反观日本文学则比较情念化、个性化、感性化。各个时代的日本人，都乐于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其思想感情。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文学担负着思想感情表达的使命。与其说日本人试图在文学作品中建设一套抽象的、体系化的理性秩序，不如说他们更倾向于顺应特殊的场面使用具体的、非体系化的、情感化的语言直接进行文本创作。

（二）历史发展的形态

中国文学已有 3 000 余年的历史，其间展现出很多璀璨夺目的精彩华章。世界

上存在过的所有文学形态几乎都可以在中国文学中找到它们的踪影。中国语言文字即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如果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汉语及作为其文字符号的汉字便是最明确、最具语言表现力的文字形式。中国文学之所以能一直保有自己的特征，其主要原因就是汉字具备得天独厚的特征。汉语文字主要具有以下几点基本特征。

(1) 几乎都是表意文字。世界上的文字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汉字属于前者。汉字的构成方式有称之为“六书”的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种方式。其中，除假借、转注、形声中含有表音要素之外，其余三种都是表意文字。

(2) 一字一音。汉字属于音节文字，并非音素文字。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单独的音节。

(3) 汉字是方块字，除极少数联绵词之外，都是独字独音。因此，大多数文字都是以个体为单位，自由地与其他文字进行组合。

(4) 单音节词语多。词语的意味、文字的形体以及音节都能够作为独立的组织成立。

(5) 有四声的区别。四声就是指四种声调。古代汉语叫作平、上、去、入。到现代逐渐演变成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人们就是利用四声区别文字极其意味的。

(6) 言文分离。书面语与口头语并行不悖，分别活跃于各自的领域。

汉字的上述六个基本特征对中国文学的形成和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致归纳有以下四点。

(1) 可以营造出具体的意象。因为汉字有能够表达意义的特点，文字与文字的排列就可以表达一种具体的意象，和骈文与赋常常是以把相同偏旁部首的字词排列在一起，营造某种特殊境界或意境。

(2) 汉字是一字一音、一文一意，这种特点就使中国诗歌的音节变化有了一系列的独特规律，也形成了外观上整齐对称的形式美。中国古代诗歌之所以具备了世界上最为严密的结构，就是得益于汉字的此种特长。

(3) 由于汉字有四声的区别，所以造就了诗歌、词曲等韵文文学的发达，并使中国的文学作品具有了鲜明的节奏感。

(4) 文言与口语体并行不悖，在客观上使中国文学同时沿着两条轨道前进，这在世界上都属罕见的现象。

同时，由于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处于近亲关系，所以它在上述所有层面与后者颇有契合之处。除此之外，日本文学还具有许多独自的特征，它是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并用。在这两种系统并举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并列的文体：汉文影响强烈的

文体和接近口语（汉文影响小）的文体，它们为提升日语的表现力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就语言而言，日语本身也有许多与其文学作品紧密相关的特征。一是以发话人与听话人的具体状况为依据的。根据两者的状况，语言与表达等都有所变化，而且根据状况的变化，有些本应出现的语言说明都可以被省去。例如，敬语表现、主语的省略、句末的暧昧表达等。二是日语的语序是修饰成分置于名词之前，动词以及否定词要放在其后。鉴于此，日语形成了始于部分而难及于全体的表达方式。许多文学作品都是醉心于局部的细微描述，迟迟凸显不出整体构造来。然而，也不乏因局部描述详细具体、生动形象而令人叹为观止的优秀之作。

（三）社会背景

中国文学具有强烈的脱中心倾向。文学活动因地域不同，其内容、形式并不拘泥于固定的规则。尤其是志在入世、积极参与政治的文人，每当政治上失意之时，常常是立即解甲归隐，专注于文学创作。同时，中国文学史上很少出现什么流派或是集团，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是以个人为单位独自进行创作活动的。总而言之，中国文学带有发散或者说分散的性格特征，并没有完全组合于体制框架之内。因此，除部分帮闲文学或风花雪月的贵族化文学之外，其余的批判精神都比较强烈，这正印证了“文以载道”的传统理念。与此相对，日本文学有着强烈的中央指向。大多数作者都集中于都市，读者也都是城市居民，作品的题材多数也来自中央生活。虽然地方上也有许多口传的民谣、民话等，但是对其进行收集整理、加以记录的却是中央。另一个特征是作家完全被组合于他所属的集团，而且对外部集团有闭关自守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学被组合进了统治阶级的文化、统治体制的整体之中。这也成了限制日本文学发展的要因，这样就产生不了反社会题材的作品。参与了体制的作家不可能对其所属的社会的价值体系予以批判，他们往往是以被赋予的价值为前提磨砺自己的感觉、锤炼自己的语言。

（四）世界观背景

中国文化具有相对开放的体系，易于接受外来思想。例如，佛教、基督教以及近现代西方思潮等都对中国的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假如没有对外来思想的摄取，就不会有今日的中国文学。然而，由于受传统理念制约，中国人在接受外来思想之际，有时会出现扭曲的现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中国人的世界观具有抽象化、理论化的倾向，在遇到某种思想文化时，可能会试图将其抽象化或理论化。并且，如果用神秘主义或玄学来处理外来思想文化，反而容易歪曲这些外来思想文化。

（2）有些人对外来思想文化容易走极端。要么以传统不可违坚决拒绝，要么放

弃甚至破坏传统。尤其是近代以后，遵守传统与摄取外来文化成了极其棘手的问题，这强烈地困扰着中国文人，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整体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相比之下，日本人的世界观具有十分执着的一面，较之外来思想文化，本土的世界观更有延续性、执着性。而且为了维系这种执着，日本人有将外来思想文化体系加以“日本化”的倾向。这一点恰好构成了日本在摄取外来思想问题上的民族特征。摒弃外来思想抽象的、理论化的一面，解构其概括性的体系，使其还原到实际的特殊领域。也就是说，排除其超越性的原理，对其体系进行重新解释，并缓和其体系的排他性。

（五）创作手法上的倾向

中国文学重视意境描写，不太推崇写实要素，创作手法喜用象征、暗示、隐喻、抒情等修辞手段。因此，中国叙事诗、史诗等并不发达且中国很久以来很少产生写现实主义的小说等文学艺术作品。相形之下，日本文学表现更倾向于再现，因此自古以来日本写实文学就很有市场，其日记文学早在平安时代就已经出现。此外，世界上最早写实风格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的诞生也是资证这点的有力证据。

（六）体裁上的特点

中国文学偏向于抒情，因此自古以来中国的诗歌极其丰富，小说和戏曲却相对落后。而日本文学倾向于叙事和即物，因此物语、读本、草纸小说非常丰富。

第二节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

在中国，对日本文学研究包括“文献学的研究”与“文学的研究”两个方面。其实，这两个叫法是日式的表达形式。用中文的表达方式来说，文献学的研究指的是以考据为主的分析研究，其客观性成分是主要因素。文学的研究则以文学理论为分析工具，是主观、客观都顾及的文学批评研究。

通过了解后知道，偏好“文献学的研究”的学者，大多在日本留过学，或有从事过日本文学研究的经历。纵览日本文学史就可以知道，日本的哲学基础很是薄弱，这就造成了日本文人不太注重文学理论研究。日本文学最早的诗文批评的概念与理论，是在中国文学推动下诞生的，有的甚至是完全借用。中国诗文先促进了日本汉诗文批评方式与价值体系的建立，而后经过奈良平安朝贵族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取舍，并融合了日本人的审美意识，逐步创造了独特的短歌与日语文章理论。

奈良时代的起止时间是公元710年—794年，正值开元·天宝年间，此时的古代

中国国力经过恢复和发展,呈现出一派鼎盛景象。政治上,以律令政治为基础,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完备,国家高度统一,形成一个庞大的多民族的东方式的封建帝国;经济上,实行均田制,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致使社会商品经济繁荣;文化上,“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教育发达,各级学校完备,学术昌隆。以此为基础,唐王朝对待周围民族、国家,采取了相对开放的政策。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香料之路”,与世界七十余国有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各国使节、商人、僧侣、学者不断前来中国,异国物品传入中国,进而各国文明也相继传入中国;同样,中华文明也通过这种交流源源传入世界各国。虽然当时盛唐文化已发展到封建社会顶峰,但是同时代的日本才刚刚开始文明起步。于是,日本在圣德太子改革和大化改新之后,全面吸收唐文化,在元明天皇即位后,仿照唐都长安在奈良建造平城京,并于和铜三年(710年)迁都至此,日本从此进入奈良时代,走上了急速封建化的道路。直到七、八世纪,日本经过学习、改良骤然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唐王朝的文明国之一。可以说由于日本在这一时期向唐王朝学习,使日本具有了成为先进国家的基础。当时日本上自统治集团内部,甚至是天皇年号,下至黎民百姓的衣冠服饰,民间风俗习惯,无一不模仿、学习唐风;国内政策重视农耕、奖励文化发展;对外加强与唐王朝的亲善关系。政治上,日本仿效唐朝律令制,中央实行两官八省制,地方实行国郡两级制度;经济上,在土地国有制——公地公民基础上,实行班田制和租庸调制;文化上,除了佛教受到唐风影响外,其他诸如文学、书法、音乐、绘画、歌舞、建筑等诸领域,都可以找到唐文化的影响因子。可以说,整个奈良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唐文化的兴盛密不可分。

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开始积极向西方学习,各界争相模仿、效法、吸收西方文明,日本文学界也是一样。“西方数百年间的各种文艺思潮和流派蜂拥而至,造成日本近代文坛派别众多、五彩纷呈的景象。许多流派在很短时间内就被另外的文学新潮取代,没有哪一种文学流派能够长期左右文学发展的走向,这就导致了日本近代文学内容庞杂、形式多样和流派交叉等的特点。”文学理论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具有指导性的,而不仅仅只是分析性话语。

文学作品的“文献学的研究”在日本学术界是被十分重视的。日本学者主要以考据、实证、统计和严谨的逻辑推理为研究方法,强调研究成果的客观性。但是在中国,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的研究者普遍都会有发表研究成果难的问题。这是因为这类研究成果的展现形式大都是对现象的陈述,会使人觉得其缺乏理论支撑。而我国的外国文学批评都普遍关注“文学的研究”,自然认为“文献学的研究”就是简单的

复述外国的研究成果，所以就抑制了文献学研究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文艺思想也随着全球化时代急速发展流入中国。一些西方的文艺理论甚至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标杆。一直到近期，有些学术界的学者才从热潮中冷静下来，仔细思考发现自己一直坚持的方法极有可能并不是唯一正确的。紧接着“西方霸权话语”“西方文论中国化”“重写中国文学史”等学术反省相继出现。虽然出现了反省，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日本文学批评而论，日本文学研究的主流地位依然被“文献学的研究”占据。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中国人→（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分析）日本文学。

日本文学批评界也有“文学的研究”，但是和“文献学的研究”比较起来却是少很多。在从事“文学的研究”的日本学者有一点是很难接受的，就是硬要用某个西方的文学理论去套在一个文学作品上，这种现象在中国却是十分常见的，应该引起一定注意。

第三节 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

一、注重研究中日当代文学发生的多元化趋势

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学批评的使命主要是意义建构、价值传承和文化批判。我们不能不承认，各种文学文本间的相互渗透是非常复杂且杂乱无序的。在多元文化结构中，各种文化在价值体系中都承担着自己的使命。我们要做的就是将文化价值系统中相互交织、复杂无序的文化因子明确地梳理出来。这样才能使多元文化因子有序排列，按照合理的规则相互渗透，生成相互化合的互动结构。现在，文化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化共存和交流以及同一民族文化内有多种文化因子共存这两个方面。当今世界，我们应该鼓励各民族文化理性交往，不能只看到自己民族这一单一的文化。

中国和日本均有着各自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虽然两国文化传承的方式不相同，但两国在文化的传承中都沿着各自的文化道路不断延伸，这是由各自的民族性所决定的。英国的社会学家安德森在他所作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里对民族性做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民族性并不等于已有的一种现实，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制造物，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共同体，这样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被想象为既是内在有限的又是至高无上的政治共同体。”民族性只是一种文化构建，而不是一种自然界里的现

实,它充满了极大的文化想象,是某个特定地方的人对自己生活个性的想象,那么体现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就必然是文学作品的一个特点。不管世界如何改变,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根基是不可能改变的。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在不断进步中继承传统,又在不断的传承中得到修正和发展,这是一个不会因人们的意志而发生转移的客观规律。

近期以来,学术界一直都在热烈探讨“西方话语霸权”。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在西方话语霸权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以及这种话语霸权究竟对中国的当代文学有多深的影响,我们暂且不说。但我们必须承认西方话语霸权的的确确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外,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极力推崇西方,几乎不设防备地接受西方文艺思潮。既然中日两国都受到西方的影响,那么两个国家的文学就一定会有相通的地方。

网络打破了人们相互交流的阻碍是全球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网络给人们提供了方便,可以做到让人们即时沟通各种问题,能通过讨论沟通,形成一定的共识。数据网络的到来使中日当代文学有了趋同的可能性。

中国一直都十分看重文学思想的教化功能,这也就意味着文学和政治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日本文学虽然与政治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但它依然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如“反战争文学”等。然而,值得引起注意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强,文学开始打破只局限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面,出现了文学作品中社会经济要素越来越多的现象,甚至一些作品服务于经济的作用更甚于服务于政治。

在当代文学多元化趋势下,中日文学都在一直向多学科、边缘化的道路上拓展,逐渐形成了“多学科—边缘化—新主流”的循环定势。这种多元化拓展趋势之间的关系交织错杂,并且涉及各个方面。所以,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应当加重研究中日当代文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二、展开中日文艺交流学研究——走向学科化文艺

交流学本身就是一门学科,为了使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局面更加开阔,努力让中日比较文学走出简单的作品与作品比较的狭隘境地,我们在此提出在中日比较文学的基础上进行中日文艺的交流学研究,并尽可能地将其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那么中日文艺交流究竟研究什么呢?

(1) 先要研究的是作者、文学作品和受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任何作品要被人接受就必须借助交流的媒介(如文字、电视、广播等)与人们进行交流,只有这样才

有可能被受众接受并认可，接着才能发挥其价值。占据中日两国文化核心的其实是两国文化中彼此互为异质的东西，这是由两国人民价值观及审美观不同的原因造成的。因此，二者对文艺作品的认知及审美感受就一定会在作品表现与再现时产生不同。同时，文艺作品的受众一定会对文艺作品的生产和交流产生一定作用，受众的需求和兴趣点也一定会影响文艺创造者的创作动机和美学标准。当然，对作者、文艺作品和受众三者关系的研究，既可以研究单一方面的现象，也可以研究中日两方的交叉现象。

（2）研究中日两国文艺交流的表现形式。

（3）研究影响中日两国文艺交流的因素。文艺交流是一个系统活动，只是这个活动异常复杂，个体和社会、生理和心理这些因素都会制约交流动机、交流对象和交流方式。比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艺交流就会受到政治因素、文化传统、经济实力、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及价值观等的影响。就个人与个人间的文艺交流来讲，对其产生影响就可能是所受到的教育、所处的社会地位、所从事的社会工作、性别、年龄等因素。

（4）研究中日两国文艺交流的媒介。

（5）研究中日两国的文艺批评。

可喜的是，近期以来我国国内出现了一批积极研究中日文艺交流的学者，并出版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李文著的《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和王琢、饶芃子编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等。

三、在文化视野之中进行文学研究

1994年，第十四次埃德蒙顿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进行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议题的热烈讨论。大会着重强调了文学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还讨论了文化的民族个性、本土与外国的相互影响、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多元化研究的方法与方式等内容。

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文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可以表现某个区域、某个时代的文化。文学是一门关于语言的艺术，这就决定了它可以把作者的审美意象完美地输送给受众，这就是所谓的显型意义。其隐型意义经常隐含在以留白为主要形式的表达中，这种审美常常存在受众的思考中，留在深刻的自我意识中。因此，我们在进行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时，不能只研究作品的显型层面，也应该注意研究其隐型层面的文化。

本土文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和外国文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有时是很不相同的。国

内的学者在研究外国文学时,面对的主要是经过翻译后的文本。艺术的创作无不凝结着作者超越时代与实践苑囿的理性追求,无不渗透着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洞察和批判。倘若译作不能够接续原作的生命,不能够映照出原作的精神核心,那它甚至没有实现最为基本的存在价值。可就算翻译水平再高,翻译时总会有许多不可能跨越的文化障碍,这些障碍就是由文化的“异质性”造成的。在研究外国文学时,很多学者面对的只有译本,很难再得到其他的背景资料,因此就只能依据翻译文本来进行研究工作。这样很多时候就只能接收翻译文本传递的显型文化信息,不能将作品放在其创作时的文化背景中研究,甚至在翻译过程中隐型文化丢失也无从知道。

受众在文学交流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在接受美学推翻了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传统文学理论后便确立了,这促进了传统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转型。

受众在文学交流活动中主体性、积极性的重要表现是文化过滤。文化过滤贯穿于文学交流活动,具有明确的功利性和方向性的,是多角度的、多层次的、立体的。在跨越国家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文化过滤,如中日文学交流时文化过滤现象存在着极大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是因为中日两国有很多文化方面的差异,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传统文化及话语体系。文化互动的重要形式,如文学翻译,其翻译过程就是文化的过滤过程,是研究文化过滤现象的一条综合的、显著的、便捷的途径。研究文化过滤,可以将比较文学研究和受众所处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还可以使我们更加有效地将文学研究置于文化视野里。

四、注重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系统性

在此所说的系统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文学作品本身的系统性,一是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系统性。文学有修辞性、媒介性、语言性、形象性、体验性等多重属性,就算是某单一的作品也依然有系统性。研究作品的系统性至少包括下面两个重要因素。

一是从文学创作的起始到创作方法的递进系统:

- (1) 是受众对文学需要的统一,即审美需要、认识需要、娱乐需要三者的统一;
- (2) 是根据受众的需求决定文学的构成方法,具体体现是人本质的对象化和社会生活的统一;
- (3) 是由文学的构成方法来决定文学根本特征,即意象的统一;
- (4) 是作为意象展开形式的文学形象,表现为主观和客观、倾向性与真实性的统一;
- (5) 是从意象及文艺形式出发从而产生情意性与形象性;

- (6) 是根据情意性与形象性创造意境、塑造典型;
- (7) 以浪漫主义手法和现实主义手法表现或再现;
- (8) 与文学的创作精神、创作主张相连的各式各样创作方法。

二是文艺鉴赏—批评—消费系统。由“创作—接受—交流—消费—再创作”构成的一个循环过程的结合体就是文学系统。作家的创作一般都是有目的地进行的,他会受到读者反馈信息的影响产生出创作灵感,之后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中表达出自己的情感或价值观。文学批评属于文学系统中的一个层次,且它可以自成一个子系统。文学批评能够通过研究分析某一作品的各种因素,如主题、体裁、人物等,来做出公正的、有价值的评价。从作品整体上来评论和研究它的思想和艺术特性是文学系统的批评观,这就要求必须从作品的全部价值来评论,不能简单机械地对作品进行分割,要动态地、全面地研究它的艺术价值。

关于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要不断开阔研究领域,进行宏观研究,从整体上对中日两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例如,对某个特定时期文艺思潮的比较研究、文体的比较研究、风格的比较研究、文论的比较研究、题材的比较研究等。

另外,拓宽比较文艺的研究领域不但可以研究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音乐、建筑等,还可以研究文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哲学、宗教等,甚至可以把这些综合起来研究,从整体上进行跨领域研究,这样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才能抓住本质。

五、加强中日文学的译介研究

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就是译介研究。他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把国外的研究成果翻译到国内,提供给国内学者借鉴参考。但在学术界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译介研究就是投机。其实不然,译介研究可以提供作品发源地的原始研究资料和这些资料的研究方法,这两种功能是什么研究方法都替代不了的。译介可以对一些由于语言及地域关系形成的障碍有很大的排除作用。另一方面是对译介本身所做的研究,这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进行的。以前的翻译研究为了总结翻译经验和指导翻译活动,很多都是关注语言的翻译及一些与之有关的伦理关系。与翻译活动不同,比较文学是研究译介本身的,把两个或几个不同的民族、文化的译者、译作或翻译行为进行审视,发现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模式。

在进行译介研究时,必须要特别注意两类误读研究:一类是因阅读能力有限造成的;另一类是和民族文化的兼容性有关的误读。误读经常发生在文学交流及文学接受时。我们一般对误读采取否定态度,认为如此对待外来文本是不合适的,但是